

新青年
文丛
XINQINGNIAN
WENCONG

余杰著

想飞的翅膀

XIANGFEI DE CHIBANG

中国电影出版社



01010439515T 郑州大学图书馆

想飞的翅膀

余杰/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Ray 4610v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飞的翅膀/余杰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9. 12

(新青年文丛)

ISBN 7-106-01581-4

I. 想… II. 余…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110 号

- 书 名 想飞的翅膀
作 者 余 杰
责任编辑 秦 赞 春 妹
责任校对 陈 德 薛 伟
装帧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625
字数/29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581-4/I·0252
定 价 21.00 元

《新青年文丛》总序

魏明伦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我有“比较癖”。80年代中期，我就斗胆作过一次貌似“荒诞”的比较。把潘金莲与安娜·卡列尼娜联在一起审视；让贾宝玉与施耐庵对面谈论；请女记者陪武则天议政；邀古代芝麻官同当代审判长说法……这种出人意料的比较，收到了引人深思的特效。

近来旧技重痒，鄙人又搞比较。摆开两套书，双方都是五册。这边五册是五个凡人分著合成的《新青年文丛》，那边五册是一位教主一手炮制的“法轮功系列”。两套表面毫无联系的书，摆到一起比较内涵，针尖立即对准麦芒。一边是教主崇拜、精神控制；一边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两种世界观相生相克，《新青年文丛》是“法轮功系列”的天敌！

“五四”运动81岁矣！民主科学先驱者启蒙创办《新青年》杂志多少年了？“德先生”“赛先生”在吾国的子孙繁衍如何？时至今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新青年文丛》作者这样的后代何其太少？而修炼法轮功，大搞教主崇拜，甘受精神控制的愚民又何其太多？

法轮功在当代中华如此暴发，如此蔓延，从反面说明我

们这个古老大国的民主传统何其薄弱？封建传统何其深厚？

早在法轮功尚未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之前，我曾与《新青年文丛》几位作者把杯交谈法轮功的成因。此物特怪，其横向来源是直线，纵向来源却是曲线。横向直贯西洋东洋，是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上帝之子会、大卫教的异邦弟兄。（那些外国邪教的信徒人数、队伍范围、发展速度、活动能量、后果影响，比起超级邪教法轮功，只算是小巫见大巫。）法轮功横向来源于此，例证鲜活，显而易见。但是，纵向来源就复杂多了，九弯十八拐，云深不知处，有待摸清脉络。上溯狐鸣篝火、赤帝斩蛇；以及黄巾太平道、白莲弥勒教、五斗米道、拜上帝会……多是装神扮佛，设教传法，自称救世主。开初，以治病练功为幌，招揽信徒，秘密结社。教主暗藏政治野心，利用教徒为自己打天下。时机成熟，武装暴动，与当时政府争夺政权。胜则称帝，败也称王。洪天王建国，明太祖登基，教主崇拜转化为帝王崇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登基的帝王传到末代，又是日薄西山，又有新的教主乱世，又是一场混战，又是一番兴亡。教主与帝王交替，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循环，构成旧中国一部二十五史。朝代改，时代变，国人的教主崇拜习惯根深蒂固，难改啊，实在难改！而国人的独立思考精神沙里淘金，罕见啊，实在罕见！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人像跳大神一样大跳忠字舞！又有那么多人像跳忠字舞一样大练法轮功！

正当庞大的信徒队伍在教主的精神控制下闭目盲从之时，《新青年文丛》的作者们却像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样凝眸思考。凡事问个为什么，反对帝王崇拜，当然也反对教主崇拜。提倡独立精神，当然拒绝精神控制。《新青年文丛》字面未触法

轮功,我们却从中汲取到与教主崇拜、精神控制截然相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且从中联想比较出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的历史渊源。更由于《新青年文丛》有不少篇幅对中世纪教会帝国、纳粹帝国、斯大林帝国进行深层解剖,又使我们联想比较出以上帝国的教主崇拜、精神控制,竟与法轮功有惊人相似之处。可以说,法轮功是未上台的纳粹,纳粹是上台执政的法轮功。

至于斯大林帝国,这称谓是《新青年文丛》两位作者赠予。乍听,不合辞典规范;细思,却是名副其实。我党我国也曾声讨苏联老大哥是“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且看《新青年文丛》作者余杰、王开岭分别剖析苏俄的专辑“俄罗斯森林”、“俄罗斯课本”等等,充分证明“新沙皇”的威风王冠戴在斯大林头上十分合适。过去,老说斯大林同志搞个人崇拜;现在看来,定性不准了。什么叫个人崇拜?转用于歌迷影迷对刘德华、张国荣的偶像痴迷,或许切合实际。崇拜个人的众人,与被崇拜的个人,皆大欢喜,毫无血腥。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岂止是个人崇拜?乃是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集于一身,精神控制与思想改造合为一事。独裁者斯大林早已霸占的双重极权,不就是野心家李洪志梦寐以求的两层王冠吗?

如果,我的“比较癖”略有道理,就再把帝国元首加纳粹“教主”希特勒推出来,与他的头号敌人斯大林比较异同。在二战风云中,斯大林站在正义一方的指挥部内。但是,反法西斯战线的首脑斯大林,却一贯使用法西斯手段残害本国人民。苏联领袖与德国领袖竞赛独裁,契卡与盖世太保,近卫军与党卫军,劳改营与集中营……竞赛成绩在伯仲之间。

大千世界真奇怪！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首脑，在教主崇拜、精神控制、暴政治国、独裁愚民的基本点上，竟是这般大同小异。现如今，两位“教主”都已灰飞烟灭，而纳粹党魁阴魂不散，转化为人民圣殿教主琼斯、大卫教主考雷什之类。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散发的瓦斯毒气，转化为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内施放的“沙林”毒气。反人类、反人性、反人权、反现代文明的各种教主粉墨登场，都以救世主义控制芸芸众生的思想。吾国被教主控制的愚民竟然数以几十万计！这种造神现象，由来已久，似曾相识，惯性推动而成，使人扼腕长叹。假若民主传统深厚，独立精神普及，何至于几十万人迷信到这步田地？封建负担沉重的中国啊，多么需要重补“五四”启蒙之课！

让激动的舌头说话，让自由的鸟儿争鸣。《新青年文丛》伴随时代之需要降生：政论、杂感、散文、游记，思辨色彩皆浓，表述方式各异。余杰之犀利、王开岭之深隽、孔庆东之幽默、杨竞之豪爽、莲子之婉约，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民主建设的砖瓦。我虽没有通读书稿，对个别文章观点也不尽赞同，仍然十分乐意应邀作序。注视这些有胆有识有志有为的青年朋友，顿觉“五四”精英没有绝嗣，毕竟还是后继有人。

万一，将来某个早晨，忽有《皇帝的新衣》闹剧露头，但愿小孩子的老实话不是来自一处。必是童声四起，真话如潮！

1999年10月于成都

自序

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我想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是一部美国电影——*Little voice*，译名叫《小嗓门》（或《声光乍泄》）。它讲述的是一个从来不开口的少女突然唱出优美的歌曲来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没有大的波澜，却深深地吸引了我。

美丽的少女从小就是哑巴，父亲早就离开了她，她与性情暴躁、生活放荡的母亲相依为命。在庞大而古老的住宅里，这位少女像石头雕成的维纳斯，保持着古典的高雅和神秘的沉默。母亲不喜欢她，时常凶猛地对她发火，而她在受到责骂的时候像小羚羊般惊恐地跑回自己的小屋。小屋里有无数美妙的唱片。她在小屋里静静地倾听着这些唱片，微笑而沉醉。这是她整个的世界。每当她倾听的时候，她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美丽和高贵。

有一天，家里安装电话，来了一个年轻而英俊的少年。次日，少年上门送用户卡，母亲不在家，少女打开了门。在那一刹那间，两颗单纯的心灵相遇了。两人眉目传情，心有灵犀。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无法开口说话的少女惊慌失措。电话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魔鬼——只要电话铃一响，她就

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她没有能力去接电话，电话线那一头的人说话的声音对于她来说是那样的可怕。于是，在电话公司当修理工的少年立即冲到客厅帮助女孩接电话，但电话却中断了。少女想对少年说什么，却已然无法开口，她痛苦而忧伤地注视着少年的离去，躲在窗帘后面。

这天晚上，母亲带回她的情人。母亲和情人都喝得半醉了，两人继续在楼下狂欢，喝酒、跳舞、做爱，喧闹的声音响彻整座宅子。无法忍受喧闹的女孩在自己的屋子里打开唱片机，可是母亲在楼下大吵大嚷，命令她立即把音乐关上。女孩第一次不听从母亲的命令，从前温顺的脸上露出倔强的神色，汹涌的感情在她的内心深处涌动着。母亲的命令第一次对女儿失效了。母亲只好在客厅里打开电唱机，播放狂暴而粗俗的音乐，然后与情人翩翩起舞。突然，家中的电线短路了，一切回归平静，只剩下母亲与情人满足的呻吟。

几乎就在同样的时刻，从楼上的小屋中传出美妙绝伦的歌声。那声音穿破小屋，穿破外面茫茫的暗夜。那声音像来自天外，没有一丝一毫的烟火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歌声像是一道闪电掠过天宇。母亲和她的情人停止了做爱。母亲说，女儿怎么又放了一张新唱片。而母亲的情人则提醒说，家里已经没有电了，这是女孩自己的声音。

一头金发，一袭白裙，一张苍白的脸颊，一双忧郁的眼睛。女孩站在小屋的中央，张开了她那打出生就没有张开过的嘴。她的喉咙就像是决堤的河水，她的从来没有活动过的舌头也无比灵巧地运动着。这是自己的声音吗？她自己也疑惑了，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表达着。喉咙与心灵之间，居然有如此神奇的联系，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之间的联系从来

没有被接通过。心灵在发出心灵的声音，而喉咙却不作一点回应。当心灵与喉咙相遇时，就像心仪很久的朋友，多年通信而未曾谋面，亲切而有些羞涩地牵手。那统治了她十多年的生命的寂静和沉默，终于在这一刻全面崩溃。而女孩的声音，就像曾经被淹没的岛屿，伤痕累累地浮出水面，迎接阳光的第一次抚摸。

女孩的眼里充盈着泪水。她只知道，这是自己的表达，自己必须表达，也终将赢得表达的权利。上帝是公平的，上帝赐给人表达的自由，上帝恩惠着地球上热爱他和热爱他的子民们。《圣经》中这样说：“义人的口，发出生命的言语，是生命的泉源。”对于这个沉默了十几年的少女而言，她唱出的是生命的言语，而同时也让别人感到甘甜。

她表达了，所以她解放了；她表达了，所以她自由了；她表达了，所以她幸福了；她表达了，所以她快乐了。

我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这部片子的。这部片子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观看。在这样的时刻，宁静而安谧的时刻，我与女孩的歌声迎面相遇。在优美的歌声后面，是一颗纯洁的心灵。女孩歌唱的不仅是音乐，而是心灵。在那天晚上之前十多年的岁月里，她在无声的黑暗中挣扎着，极其苦楚，却没有外露出任何挣扎的痕迹。女孩是安详的、温和的，有的时候她专注于某一家具，整整一刻钟，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她简直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动物。她不断地内敛，直到声音喷涌而出的那一刻。是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剥夺一个人表达的权利，死亡也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哑巴”——哑巴只是暂时失去了表达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终究会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神秘地回归。

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开始思索表达的可贵与可能。

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重新回到“为什么写作”和“写作什么”这两个原初的命题上来。

表达是可贵的，表达申明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我不相信“我思故我在”，仅仅是思考还不足以表明自我的存在；我相信“我说故我在”，表达是宣告自我存在的惟一方式。真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获得它的真理性的，如果真理仅仅存在于体悟和思维之中，那么对真理的捍卫就无从谈起。真理的进步和深入，是在一个又一个感受到真理的人对真理大无畏的言说中展开的。耶稣为了表达自己体验到的真理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布鲁诺也因为表达自己所体验到的真理而被施以火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鲁诺比那些宣称是耶稣信徒的并以此为理由烧死他的人更配得上是耶稣的信徒。人类因表达而高贵。每一个人也因为表达而成为千姿百态的、独一无二的个体。

表达也是可能的，在人类文明最为晦暗不明的时刻（例如被宗教裁判所主宰的中世纪、纳粹德国和斯大林帝国），表达也不会丧失其全部的可能性。就像石头缝隙中的小草，不屈不挠地向往着阳光。就因为对阳光的向往，小草也能够顶起大石头。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是在寻求表达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得以发挥的。如果人类失去了对表达孜孜不倦的渴望，那么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就停滞了。任何专制和极权的力量，不管它们有多么巨大，也不能消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表达的需要。这也是我对人类最主要的信念之一。电影中那个柔弱而坚强的女孩，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凤凰浴火般的永生。而我在观看女孩故事的过程中，也再次坚定了

自己献身于“表达”的信念，再次确认了自我写作的立场和目标。

我把我的生命以及作为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写作，看成是对表达的可能性的一种追寻。而生命和写作的快乐、痛苦、困惑、艰辛，全是源于我强烈的表达的本能。

生命是谦卑的，写作也一样。我从来不把生命以及写作看作是“不朽之伟业，千古之盛事”。我认为，以那种心态去完成自己的生命之旅和文字生涯，到头来只会一无所获——你会发现你在沙滩上留下了一座恢宏的城堡，但那仅仅是沙滩上的城堡，潮水一来它就立刻化为乌有。为思想而人生、为文学而人生、为艺术而人生，那是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仅仅是为“表达”而人生。

当我在北大开始我的青春岁月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相当数量的人们过于傲慢地对待生命，过于傲慢地对待写作，过于傲慢地对待这个世界。他们把自己看作金字塔顶尖的精英分子，俯首芸芸众生。他们使用“学术”、“文化”、“文学”、“科学”等宏大的词语来表明、来张扬自我生命的价值。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而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也更有价值。而我认为，生命本真的价值并不在这些宏大的词语上，而在另一个平淡无奇的词语上——“表达”。我赞成歌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树的生命需要光合作用，而人的生命需要倾听和表达。面对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模糊不清的现实，首先要完成的是对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的区分和甄别。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生命的尊严。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一种为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的写作。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低调，这简直就是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调。我的这一看法与许多学者和文人是相反的。我最崇敬的人物是《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我认为他在人类精神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跟耶稣、布鲁诺并肩而立。皇帝一丝不挂，这当然是一个人都看到的常识，无需论证、无需实验、无需经过艰巨的思考和详尽的推断。但是，表达出这一常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举国上下都没有人说出“皇帝一丝不挂”的真相呢——包括那么多睿智的哲人、才华横溢的诗人以及锐利的批评家？他们拒绝了表达，自由也就离他们远去。他们拒绝了表达，也就丧失了生命起码的尊严。他们拒绝了表达，他们的知识、智慧和才华在那一瞬间顿时变得轻如鸿毛。而小孩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帝国因为他的表达而置身于尴尬之中。阿基米德用一个支点撬起了地球，而小孩用他的表达将被愚昧所淹没的历史拯救出来。

常识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在一个信息自由流通、常识被公众普遍接受的社会里，表达常识当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常识都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并内化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在一个常识被掩盖、被扭曲的社会里，在一个不把常识当作常识、常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还没有定格为常识的社会里，申明常识的意义，并不比从事原生态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工作的价值低。那个天真而勇敢的小孩敢于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并为此而承担有可能被抄家灭门的后果。而我所说出的至多就是皇帝穿的衣裳不那么漂亮而已——我时时因为自己的这种怯懦的“委婉”而羞愧。安徒生写《皇帝的新装》，主角当然不是皇帝，而是这个孩子。

《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是某些伪善的成年人的一面镜子，也是我终身仰望的一个榜样。他敢于表达和宣示常识的勇气，让那些比他年长、比他智慧、比他博学的人感到惭愧。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与嘲讽这位伟大的孩子呢？

中国并不缺少学者、教授和作家，中国缺少的是真实地表达自我和自我对世界的认识的人。寻求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是我赋予自己毕生的事业。我要表达和交流的主要是常识。一切复杂、深奥的知识都是从常识开始的。我相信，表达和捍卫常识，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与邪恶、与专制、与奴役作战。我是不是一名学者或者一个作家，这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表达”着。邪恶的泛滥，邪恶的盛行，根源在于信息被垄断和人们普遍存在着对表达的恐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的剑桥大学教授阿马地亚·森是专门研究世界饥荒问题的。他的研究成果表明：保证自由表达和自由交流的民主制度能有效地避免饥荒和经济灾难。相反，古代帝国、极权与独裁政权则容易受到饥荒的侵袭，因为它们缺乏批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信息被高度垄断，真相作为特权禁锢在极小的范围内。由此，阿马地亚·森提出“信息饥荒论”，主要观点是：封闭了正确的质疑信息，导致错误信息的泛滥。阿马地亚·森教授的这一理论，显然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重大的意义。灾难的降临，起源于不敢表达、不敢言说、不敢陈述。当不敢表达、不敢言说、不敢陈述由压迫变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灾难就接二连三地前来打击我们。要避免灾难对我们的控制，最紧迫的措施就是拓展表达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是我们一点点争取来的，每多一分表达的自由，我们就多了一分安全的保障。而对于一个现代国家

来说，最坚实、最持久的保障，不是武器的先进，也不是军队的庞大，而是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观点的自由表达。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位被淡忘的美国人：潘恩。他是一个一辈子表达常识、申明常识、传播常识和捍卫常识的人。他写作了一本名字就叫《常识》的书，这本书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从一个军官变成一个常识的表达者，他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他的《常识》被千千万万人所阅读，而他本人却寂寞地死去。潘恩对于美国的意义不亚于华盛顿和林肯，潘恩对世界的意义不亚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正是由于潘恩以及千千万万像潘恩这样的人的努力，美国才成其为今天的美国。我对美国的喜爱与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接受常识、尊重常识、按照常识行事的国家。然而，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会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所谓的“自然灾害”的三年，恰恰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三千万饥民，不仅仅是死于饥饿，更重要的是死于失去了表达的可能性。

我的朋友摩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常识是我们时代的第一重悲哀，假装超越了常识并进而摆出一副嘲笑常识、否定常识、蔑视常识的姿态，是我们时代的第二重悲哀。要找‘国人蒙昧化程度居高不下’的原因，我看我们老是在宣示常识与剿灭常识之间颠簸徘徊，就是原因之一。每一代人都要从零开始寻找常识，每一代人都要为言说常识付出血的代价，这样的民族能不蒙昧吗？鲁迅先生为了减少我们的蒙昧，就是从常识入手的。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宣示常识。而且，鲁迅恰恰是在进入中年以后才开始决意以宣示常识为己任的。言说常识并不只是知识活动和逻辑活

动，鲁迅在言说常识的过程中挺立起了一代仁者的良知。”我非常同意摩罗的这一说法。的确，与世界上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相比，鲁迅并没有创建一个庞大的、崭新的思想体系，这当然是鲁迅的遗憾。但是鲁迅在一个不把常识当作常识的国家里，为宣讲和捍卫常识奋斗一生，并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狡猾的政治家利用他、聪明的文人攻击他、昏睡的民众嘲笑他。他承受着这一切，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生命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先生对于 20 世纪中国的贡献，比创建一个思想体系不知道重大了多少倍。

可悲的是，先生告别我们半个多世纪了，先生所宣讲和捍卫的常识，在中国依然没有变成常识。常识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好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油是油、水是水。在今天，宣讲和捍卫常识所面临的困难，丝毫不亚于鲁迅先生当年。我愿意跟随鲁迅先生，以表达和宣示常识为己任。这几年来，我对自己的写作的定位越来越清晰。我的所有文章，都可以看成是关于常识的文章。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深知，表达与宣示常识的道路，也是一条漫长和崎岖的道路。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位寻找表达的自由、宣示常识的价值的伟人。这位伟人为这一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罪恶的子弹穿透他身体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我看到了一生苦苦追寻的真理。”然后扑倒在身边信徒的怀抱里。

他就是“圣雄”甘地。我最看重的甘地，并不是那个为印度的独立而奋斗的甘地，而是那个帮助“贱民”表达生存权利的甘地。当然，前一个甘地是伟大的，但后一个甘地在我个人的心目中更加伟大。

在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种姓制度。严格划分等级的封闭式社会结构是印度教的显著特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印度逐渐形成一个失去种姓的群体，他们或被驱逐，或因从事“不洁”的工作而为印度教群体所不容。他们不得进入寺庙，他们的孩子不得同有种姓身份的孩子一起上学，甚至不准许他们使用村里的水井。他们的影子对拥有较高种姓身份的人也是一种玷污。和他们一起用餐或接受他们的饭菜都是不允许的。这些失去种姓的人，这些所谓的“贱民”，是严格意义上“不可接触的人”。

甘地热爱祖国印度，但对“不可接触者制度”这一印度社会的毒瘤深感惭愧。这一反人道的称谓严重地挫伤了他纯洁的感情。当甘地致力于印度人民生活方式的改革和国民教育，像医生一样医治印度社会肌体的疾病和溃疡的时候，他把消灭“不可接触者制度”作为自己奋斗的主要目标。

甘地知道，有些话是必须说的。他热爱印度，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印度现实的激烈批判。惟其如此，他才是印度最杰出的儿子。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我不相信，能够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然而，我相信平等的学说，正如黑天神在《纪达圣歌》里所宣扬的那样。……书中坚持认为，清洁工也应该像一个饱学之士那样获得同样的尊重。我们的责任在于，不让‘不可接触者’感到人们轻视他们，瞧不起他们。我们不应将自己餐桌上的残羹剩饭送给他们，作为他们维持生活之需。不管是婆罗门还是清洁工，他们都信奉同一个神，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同样纯洁，我怎么能够同意对他们不一视同仁呢？如果我将不洁的剩饭送给一名清洁工，如果当一名清洁工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拒绝了他，我认为这是一种罪恶。”